周明：忆40年前的“一串春雷”

提起40年前《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哥德巴赫猜想》《小木屋》《船长》《颂“一团火”》等报告文学，不少国人记忆犹新。《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总主编王蒙曾说，这股报告文学热，在当时成为“扭转乾坤，拨乱反正的一支力量，成为唤醒郁闷无奈的国人的一串春雷”。

拨乱反正的春雷

周明今年83岁。他1955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京，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57年调《人民文学》编辑部。后来，他经历了“反右”“文革”等风风雨雨，并曾和众多作家一起下放干校锻炼，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75年9月，周明从干校调回北京，参加《人民文学》复刊筹备工作。1977年初，周明与编辑部的一群年轻人，策划出版了一期纪念周总理的专号，大受读者欢迎。接着，他们又着手组织纪念贺龙元帅的文章。当时，贺龙元帅还没有平反，周明和编辑部的同事辗转找到了以创作短篇小说《党费》、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闻名的部队作家王愿坚，请这位对贺龙比较熟悉的作家来写，王愿坚欣然应允。周明联系好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又陪王愿坚上门采访……

这些怀念老一辈革命家的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一经刊出，不仅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甚至被敏锐的国外媒体当作思想解放的信号予以报道。

上世纪80年代中叶，周明将这类文章结集，主编成一套六本、数百万字的丛书《历史在这里沉思》，发行量达数百万册。

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

“科学的春天”的春雷

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明在探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时，发现他家墙上新添一幅书法，是时年八十高寿的叶剑英元帅的一首新诗《攻关》。周明读后很振奋，就恳请王炳南帮忙联系叶帅“约稿”，将此诗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上发表，随后，《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使这首诗在全国知识界和广大中小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方毅说，这首诗“寄托着对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国家决定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并定于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这样的形势下，周明与同事想到他们应负的责任和使命，决定推出一篇报告文学，呼吁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

写谁呢？编辑部展开了热烈而坦诚的讨论。突然，他们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个故事：70年代初，一个外国代表团来访问，一位美国专家点名要见陈景润。负责接待的领导没听说过陈景润，就让人去找，结果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说是在“牛棚”找到的）。当时，编辑部也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是国际数学界的一个大难题。在当时，国内没有刊物能发表这样的论文，陈景润是把论文偷偷寄到国外发表的，从而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重视，是十分了不起的。编辑部同事一致认为，就写陈景润吧。

请哪个作家来写呢？那个时代，熟悉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的作家比较少。说来说去，大家很快就都想到了徐迟。徐迟是著名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1962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

周明电话联系上徐迟，徐迟马上收拾行装到了北京。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依然禁锢在牢笼中，对陈景润争议依然很大。周明说，在徐迟到北京之前，他与科学院电话联系时，接电话的人曾委婉地说，我们有很多又红又专的科学家你们不写，陈景润这样的人怎么能作为典型宣传？好在中科院领导方毅同志思想很开明，周明就与他的秘书联系，获得同意。

周明陪徐迟采访陈景润，去了三次。第一次是一个艳阳秋日。在中科院数学所，他们见到陈景润，问“哥德巴赫猜想”攻关进展如何，陈景润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们又问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陈景润说，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的一份信，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据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学者三千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只有十几名，其中，亚洲只有两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另一个便是陈景润。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数学所和中科院的领导。领导对他说，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由你考虑决定去还是不去。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他回到所里，经过一番了解、思索后，写了一封回信，提了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台湾却占据着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听到这里，徐迟当即被陈景润打动了。他动情地悄声对周明说到：“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当晚，周明直奔《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家，当面向他汇报了这次采访的见闻、感受。张老饶有兴味地听着，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发表。”

徐迟住在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一家招待所，开始从外围进行采访。他了解到人们对陈景润的评价褒贬不一，并对各种说法都认真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全面地判断。”

周明第二次陪同徐迟与陈景润见面时，徐迟有备而来地抛出三个数学问题。不再腼腆拘谨的陈景润，也不管徐迟懂不懂，直接把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徐迟抄下来，或者说是照猫画虎地描画了下来。

周明（后排右二）与《哥德巴赫猜想》作者徐迟（前排右一）及陈景润（前排右二）等

在中科院数学所采访一周多，徐迟和陈景润建立了密切关系，甚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他几次对陈景润提出到他居住和演算的斗室去看看，但陈景润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丝毫不回应。徐迟认为，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周明风趣地说，他和徐迟搞了点“阳谋诡计”，才得以进入陈景润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进行第三次采访的。那天，周明、徐迟和数学所书记李尚杰三人一同去陈景润的房间。老李先敲门进屋，周明和徐迟过了二十分钟后才去敲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就抢先开了门，周明和徐迟迅速跨进屋。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对当时室内的情景，周明至今记忆犹新：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办公桌上常用的一小片地方稍干净些外，其他地方落满了灰尘，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立在墙角，一个装的是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手稿和废纸……条件真艰苦啊！周明感叹。

徐迟用了一个星期采访，一个星期写稿。一个月后，周明和徐迟一起讨论，并请李尚杰订正了一些事实。徐迟修改好稿件，周明立即送交张光年审阅。张老看后，连声激赏道好！

1978年1月，《人民文学》在头条刊发了《哥德巴赫猜想》。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个整版做了转载。

《哥德巴赫猜想》成为迎接“科学的春天”的一声春雷，不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还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挂在当时人们的嘴边。徐迟激动地说：“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似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

思想解放的春雷

进入1978年，作为《人民文学》报告文学选题策划人，周明召集了一批文朋诗友，组成了《人民文学》特约记者小组，专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

第一个招来的，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被周明拉到报告文学写作队伍上来”的女作家黄宗英。她从上海赶到北京，列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寻找写作素材，对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秦官属产生了兴趣。秦官属扎根秦巴山区，不仅忍受自然条件之艰苦，还遭受各种人为的非议、为难，乃至打击、迫害，但他始终不改初心，创办中药材基地，从事科学研究。会后，周明联系、协调陕西科委等部门，安排黄宗英前往采访。黄宗英赶赴秦巴山地基地，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采访了秦官属众多的同事和当地山民，写下了报告文学作品《大雁情》，反映了我国知识分子在探索科教兴国之路上历尽坎坷不改初心的感人事迹。这篇报告文学后来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周明还在陪同黄宗英采写报告文学《小木屋》时，亲历了她置生死于度外的经过。那是1982年10月3日，黄宗英率领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在西藏参观访问一个月后，第二天就要飞返北京时，竟突然提出退票，要留下进西藏林区采访徐凤翔。周明时任代表团秘书长，再三劝她一块儿回北京。谁知，黄宗英一听就急眼了，和周明争吵起来：“周明，咱们是老朋友了，你难道这点都不理解我，支持我？”

黄宗英（中）、徐凤翔（右）在雅鲁藏布大峡谷

黄宗英追随女科学家徐凤翔，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在西藏高原波密林区钻了两个月，采访搜集素材，甚至在无人做饭时“客串”炊事员。之后，她回到上海家中，在农历大年三十夜，在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中，一夜无眠，写出报告文学《小木屋》……

后来，周明还陪黄宗英二进西藏，带着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摄制组，在波密的原始森林里和徐凤翔再次相会。这一次，徐凤翔主“演”，黄宗英也出镜，拍摄一部创新纪录性的电视报告艺术片。拍摄期间，周明和黄宗英还说服摄制组负责人，从拍摄经费中省下一笔开支，在当地驻军帮助下，为徐凤翔建起了一座真正的小木屋！

10年后的1993年岁末，已经声明“归隐书林”的黄宗英，接到徐凤翔一封“想去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考察，但是没有这笔经费”的来信。黄宗英重燃热情，为徐凤翔四处呼吁，筹措到考察经费，满足了徐凤翔的心愿。

改革开放的春雷

特约记者小组招来的第二个，是女作家柯岩。早在上世纪50年代，柯岩就以儿童诗集《“小迷糊”阿姨》等闻名。1976年，这位貌似柔弱但本性好强的女作家，冒着极大的风险创作了《周总理，你在哪里》等抒情长诗，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共鸣，很快风靡全国。

1979年夏季的一天，周明代表《人民文学》编辑部给柯岩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一定得答应我们一件事。”二人因为来往多年，交情深厚，周明几乎用下命令的口气说：“给我们写一篇报告文学，为建国三十周年用。我们已给你找好了线索……”柯岩答应了。这就是她写作报告文学《船长》的起因。

“Seamanship，seamanship，人有人的风度，船有船的风度，国有国的风度！但愿——但愿我们每个人也能时时刻刻记住这一点吧！”《船长》写的是我国海运英模人物贝汉廷驾驭码头生活、驾驭海洋波涛、驾驭海运贸易、驾驭多国语言、驾驭人际关系的动人事迹。柯岩在纷杂的素材中，选出了亮点，就是贝汉廷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在海上，贝汉廷像是一块冲不动的礁石。在岸上，贝汉廷是一块千锤百炼的钢铁。”这篇报告文学刊登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立即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被外界看作中国这只巨轮，在船长引领下，从长江航向大海、融入世界的宣言书！

《船长》的成功，让柯岩也受到极大鼓舞。由此开始，《东方的明珠》《她爱祖国的明天》《美的追求者》……一篇篇佳作问世。这样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让原本体弱多病的柯岩病倒了，被“关”进医院。但谁能料想得到，她在医院里竟偷偷采访，写成了报告文学《癌症≠死亡》。2011年12月11日，82岁的柯岩因病在北京逝世。周明感叹，她的作品留在了人间，留下了正气，留下了清气，留下了浩气！

周明至今记忆最深的，也最感动的，是冰心先生不顾78岁高龄，主动请缨，加入《人民文学》特约记者小组。冰心老人和周明商量，决定写一篇年已60岁的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糖果部售货员张秉贵的报告文学。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周明陪同冰心老人三访张秉贵。在采访中，张秉贵向冰心谈起了他在旧社会经历过的辛酸往事和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为人民服务的感受。冰心曾问张秉贵：“您的‘一抓准’和‘一口清’硬功夫是怎样练成的？”张秉贵说：“干食品行业几十年，只要用心就能够练成。”

1978年7月10日，冰心冒着酷暑，去百货大楼对张秉贵进行第二次采访。来到糖果组柜台，只见柜台前人山人海，都在围着张秉贵。冰心对周明说：“咱们别打扰他，从旁边看。”只见张秉贵有条不紊地忙着，脸上始终带着微笑，无论顾客要几斤、几两糖果，只要话音一落，他一把就能抓准糖果的重量，利索地包好，并报出钱数、收钱、找零，同时接待下一个顾客……这一系列动作，只需短短的一分钟。从糖果部出来，冰心又对百货大楼的负责人和张秉贵的几位同事进行了采访。在采访中，她了解到这样一件趣事：有一天，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指着货架上的糖果对张秉贵说：“我要买两块二一斤的双喜奶糖二两二，一块一毛五一斤的脆口香三两七，三块四一斤的迎宾奶糖二两八，一块六一斤的广州水果糖一两三。”见那位客人不再说话，张秉贵就问道：“您还要点什么吗？”顾客说：“不要什么了。这些糖果多少钱？”张秉贵马上说：“两块零七分。”这位顾客展开手心，只见上面写着“2.07”。他激动地说：“咱们是同行，看到报纸上宣传您的‘一口清’本领，起初我还不太相信，这下我可是真服了！”

冰心

周明陪同冰心第三次采访，专门约见张秉贵，对前两次采访得到的材料和细节进行了全面核实。冰心还要了一些青年人给张秉贵同志写的信来看。后来，冰心写成报告文学《颂“一团火”》，文发表在《人民文学》，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

一系列既接地气，又影响深远的报告文学相继在《人民文学》刊登，得到国人广泛响应和共鸣，为该刊赢得了高达150万的发行量。随后，《当代》《文汇月刊》《解放军文艺》《十月》等杂志争抢刊登报告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也不甘落后，开专版刊登报告文学。

周明感叹，纪念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等的文章如春雷划破长空，叶帅《攻关》诗发出号令，作家徐迟打头，文坛“三女侠”黄宗英、柯岩、冰心紧跟冲锋陷阵，一系列报告文学发表，为科学春天导航，为思想解放启蒙，之后，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

□ 李满星

人物春秋

古代身份证如何证明我是我

在当今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身份证，其实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的第一代身份证直到1984年才正式发行，在这之前承担证明自己身份这个“艰巨任务”的是林林总总的单位介绍信。那么，中国古代有身份证吗？

中国古代并没有身份证，倒是有两样与身份证相似的证件，那就是符牌与传信。相较而言，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传信侧重于准入通行。

符牌：都是有身份的人

先说符牌。符牌最早是兵权及君权的象征。《史记·五帝》所记载的“轩辕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里的“符”其实就是兵符。《周礼》的记载则更为清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珍圭代表君权，牙璋代表兵权，其内涵都是权力的物化与延伸，大有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见黑木令如见教主本人”的意味。当然，这些符信还带有防伪功能，《说文解字》称其“分而相合”，也就是先将一整块符牌一分为二，使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在一起以验真伪——现代汉语中的“符合”一词，也正渊源于此。

秦汉以后，符牌逐渐衍生出节、虎符、竹使符等门类。苏武持节出使匈奴，所持的节也属此类；虎符与竹使符则一主发兵、一主征兵。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符牌渐渐与官员的身份有了交集。唐朝时，朝廷为了“明贵贱，应召命”，根据官员不同的品级发放金、银、铜制的鱼符，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员还佩有专门的鱼袋。宋朝时鱼符被废除，但鱼袋保留了下来，文豪苏东坡便曾被赐以银色鱼袋，以代表着他朝廷命官的尊贵身份。

到了明清时代，符牌渐渐褪去了唐宋的古韵森森，最终演变成牙牌与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职，有时还会刻上使用范围与禁令。清朝腰牌就更为完备，还加上编号、年龄、相貌特征、发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后世的身份证已经大同小异。

即便如此，牙牌与腰牌也不宜被视为中国古代的身份证。符牌所证明的并不是某一个体的身份，而是某一阶层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牙牌、腰牌与朝服一样，代表了官员的等级地位，而防伪功能只是基于这种等级地位的自然延伸。手握符牌的人，不是“有身份证的人”，而是“有身份的人”。

传信：留下凭证才能过

再说传信。古代中国的人口流动并不算频繁，但终究不可避免。为了保证这种流动的正常进行，传信便应运而生。

传信是古代过关津、宿驿站、乘驿站车马的凭证。与符牌不同，传信一般是由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证明，上面所记载的信息更详细。传信有些像是身份证、介绍信、预付卡的混合体，而且其防伪方式与符牌一样都是“两相堪合”。

与传信相似的还有过所。过所在唐朝最为盛行——唐朝商业兴盛，幅员辽阔，为了有效打击偷漏国税、逃避赋役等活动，过所的申请手续颇为繁复：申请者要将人数、身份、申请理由、携带货物、行经路线等详细说明，必要时还要附交有关证件。

传信制作繁琐，在流动人口较多的边关使用颇为不便，于是便诞生了“简易版”的传信：繻。守关的官吏将帛撕开当证物，需要时只要对比一下撕裂口便能确定真伪。虽然少了几分仪式感，但功效一点不差。

除了上述传信之外，还有棨这一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才可以使用的特殊传信。棨分为信与戟，棨信是丝质的信件，可以悬挂起来作为徽帜；桨戟为木质，官吏出行时可作为仪仗，这自然是一般百姓所无福消受的了。

以上五花八门的传信，同样也不能看作身份证的滥觞。传信所针对的重点是“出入”这一事件而非使用者本人，如果没有人口流动，传信便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与身份证的人身属性有着本质区别。

户籍：民不迁农不移

为什么古代中国诞生了符牌、传信，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呢？

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便费尽心力将户籍制度与土地、赋税制度相结合，以预防人口流失：楚国的户籍册详细记录了居住者的居住地与身份；宋国的户籍册配有相应的地图；秦国更是实现了“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的精细化管理。

可见，在古代君主眼中，人口只是活动的“财产”，所以户籍制度也就成了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与公民权利毫无关系。秦朝自商鞅变法后户籍制度愈加严格，每个人的户籍信息中甚至附有由画师所画“照身贴”，人口迁移时不办理“更籍”即为“阑亡”。

当人口成为“财产”，三六九等的划分自然也不可避免。秦国的户籍政策已经有了“宗室籍”“爵籍”等“高阶户籍”。西汉《户律》更进一步按资产将民籍划分成了“小家”“大家”“高赀富人”等户等，人口本身的“财产”属性进一步得到强化。

朝廷对人口的管控直到唐朝实施“两税法”才渐渐放松。其后经过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层层推进，户籍政策与赋税制度愈加渐行渐远，人口的流动也由此摆脱土地的束缚。而只有当户籍政策不再成为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时，作为公民权标志的身份证制度才有可能逐渐孕育出来。古代中国只有符牌与传信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其原因也在于此。

按照明清两朝的发展趋势，身份证制度很可能在人口与土地、赋税脱钩的前提下逐渐发展出来。清末在“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制定了《户籍法》。这部《户籍法》只是来得及实施，但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在此之前，中国历朝的户籍制度都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在此之后，户籍制度渐渐成为公民权的象征，最终孕育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制度。身份证虽然轻巧，但它身上却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户籍发展史，以及东西文化碰撞时那一段斑驳破碎的时代。

□ 江隐龙

往 事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零售价壹元